

斯密的经济道德情操药方

李俊辰 (jonsson.li@gmail.com)

欧金伦敦投资有限公司特约经济学家和投资顾问

在本栏上次的文章提及在英格兰银行今年发行的新版20英镑纸币上,人物头像由现代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取代了英格兰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斯密今天最受人注目的当然是他的《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被视为是竞争与市场力量概念的原创作品,至今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论著。不过,以笔者来看,市场经济中的道德问题似乎更得到斯密的重视——《国富论》出版后只修订了两次,而斯密所著的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却修订了五次,而且斯密直到死前三个月还在抱病做最后的修改和充实,可见道德问题在斯密这位“经济学之父”心中的地位。

在斯密那个时代,“道德情操”一词是用来指人“被设想为本能上是自私的动物”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能力,即作出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是阐明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感情或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或行为,以及如何建立一个有确立行为准则必要的社会。

斯密致力研究“道德情操”这个主题可以追溯到1737年他以出色的成绩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出类拔萃的道德哲学教授哈奇森以渊博学识与高尚人格给斯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哈奇森似乎注意到了斯密的天资,把他介绍给了当时正在写作《人性论》的哲学大家大卫·休谟。1740年,斯密作为斯内尔奖学金的获得者被推荐到牛津大学深造。在那里,斯密致力钻研《人性论》等当代和古代伟大思想家的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古典哲学与当代哲学的基础。1759年4月,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操论》。

在听取了研究哲学的朋友们的意见后,斯密对《道德情操论》第二版做出了具有重大价值的修改,即发展了有关公正的旁观者的理论,明确提出良心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产物。此外,斯密加强了对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于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学作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斯密论证了在经济自由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能够迅速地推动财富的积累,并围绕这个中心,初步分析了当时英国经济生活的基本问题,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从而确定了他经济研究的总方向及其经济理论体系的中心思想。因此,这次演讲中所阐明的基本思想,可以看作是他后来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雏形。

今天的全球经济中,要求进行道德投资和企业社会责任呼声越来越高。而这一切,早已在斯密的预料中。在他看来,这是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然而,如何将道德

引入其间,也是斯密毕生的追求。250年前,在英国经济迅猛发展之时,斯密曾满怀热情地呼吁政府放弃一切阻碍人们发财致富的政策,而采用顺应和放任人类天性,激发和利用人人都有着的自利动机来增进个人财富和社会利益的制度和政策。然而,斯密在观察了英国社会产业革命30年后的情况,发现迅速富裕起来的英国人尤其是商人阶级,道德腐败愈演愈烈。曾认为财富与德性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的他,不得不承认通向财富和通向德性不是一条路子。这里的内在矛盾意味着现实选择的困难,既不能要求人放弃财富而追求德性,更不能放弃德性而追求财富。不过,他或许希望道德情操和私利最终都将达成相同的目标。今天许多世界富豪的慈善活动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

两百多年过去了,在这个钱潮滚滚而“礼崩乐坏”的时代,笔者回国时发现,中国的各个阶层似乎都有些彷徨,究竟该何去何从?当年斯密开出的药方是两个,第一,人的幸福感与外在的东西关系很小,钱多钱少无关乎快乐和幸福,内心的宁静平和才是幸福之源;第二,每个人都要唤起自己“同情共感”的天然能力,成为自己和他人的“公正旁观者”,努力做到推己及人。他认为,无论贫穷还是富裕,做到这两点就能够培养起一种自制和自律的德性,才能克服虚荣、狂妄的心态。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享有真正的幸福和快乐,也有可能增进他人的幸福和快乐。

今天,中国人也开始关注商业社会中财富与德性的关系问题了。不久前,在中国环境保护史上发生了两件引起世人极度关注的大事。一件是厦门市政府宣布投资海沧的PX(对二甲苯)化工项目缓建。另一件是大湖蓝藻引起无锡市自来水发臭,无法正常饮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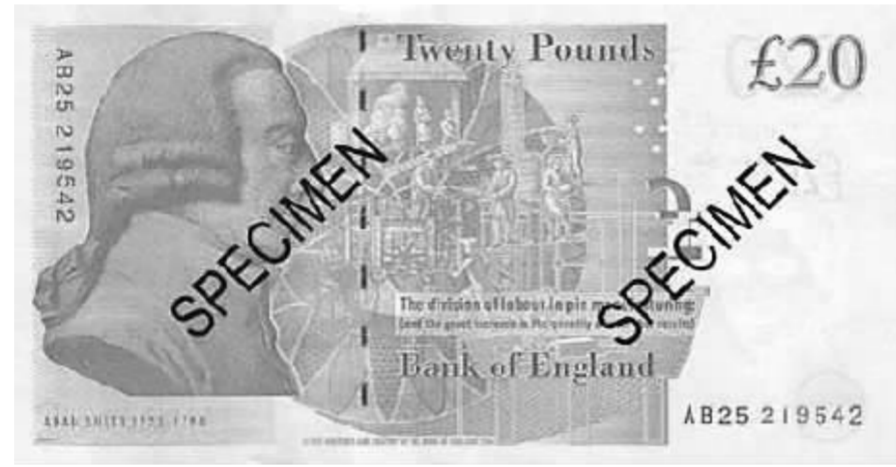
对一般中国人来说,都以为新鲜的空气

和清澈的水是最充分的,甚至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资源,但在PX与蓝藻面前,两大资源顿时匮乏,出现危机。今年8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四天后,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开始审议包括《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在内的数部法律。该法系首次进入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审议程序。《水污染防治法》出台于1984年,曾在11年前有过第一次修订,此番再次修订,新增条款达26条,修改较大的条款24条,而该法原先只有62条,其调整力度可谓空前,意义非同寻常。

《美国商业周刊》不久前刊文说:尽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生态环境却急剧恶化。如今,中国汇集了世界上最高浓度的烟雾、酸雨、河湖污染,以及最严重的森林砍伐和荒漠扩大。这和相关企业及政府追求片面GDP发展有相当大的发展。而此前,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世界银行估计,中国近60%的城市人口居住城市的空气;污染水平至少是美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水平的5倍。污染型增长的经济代价非常巨大,但很难计算。世行报告估计,在2003年,污染的健康代价约为GDP的6%,即7810亿元人民币,但这还不包括治理成本,以及当前可持续发展对工业造成的未来成本。

无可否认,经济发展必须受到法律和道德监督和制约,企业必须促进教育和发展等社会行为。“君子好财,取之有道”——这句话反映了合理化或道德化的经济学最原始的道理。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应保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任何非法、非道德地“掠夺”致富都是对社会发展的践踏。在先天不足的法律监督下,如果能有的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理念变革,那是一种对社会的真正的责任感。

在中国,学界有类似“经济学要不要讲道德”、“伦理学要不要科学化”等方面的问题。在患得患失于效率与平等、发展与代价、经济与道德、自由与公正之间的情况下,企业和政府了解一下亚当·斯密的理论,或许会有一些新的启发。因为,如何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状态下,进行道德投资和道德情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当学术经济风靡之后……

张赐琪

社会学研究者
上海“东方讲坛”讲师

学术与经济的联姻是当下的时尚,不少学术顺势而为了经济领域的“新秀”。在以财富英雄的年代,这样的“择木而栖”未必不智慧。

虽然学术经济的称谓不知起于何时,但学术界内外倒是有着一定的共识——顾名思义,就是经济化的学术,或学术型的经济。网络上有人考证,其最早似出于清代爱国学者黄懋材语:本学术经济,不乐为外吏”。该词条的现代意义则被引申为:具备系统知识学问的人,或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所从事的经济化的学术活动。

因着现代学术活动可以带来显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这一妇孺皆知的事实,学术经济的运作似无可厚非。

有学者直言不讳:“学术者,当存其时代元素——经济因素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学术经济形成了崭新的发展模式。依照“动作经济原则”——以最优秀的脑力劳动得到最大化的社会经济效能为目标,学术经济顺利地演变为学术经济,研究者经济,高等学府经济。于是,学术经济的魂灵居庙堂之高——在强调学术研究成果转化观念;促使单一型、学术型研究向学术经济型产业发展;加速学术交流与产学研相结合等方面,成功主导着高校和研究机构学术活动的主旋律,并冠之以“为社会服务”的响亮标识。

什么事情都有个度,一旦超越了这个度,事情马上就变味了。在学术经济的运作中,当经济利益成为部分学者追求的唯一目标时,学术便无奈地成了控制资源、攫取财富的幌子了。

较为典型的是所谓“资源导向”型研究,即以获得高额经济报酬为主要取向的学术

活动。为了拿到项目经费不惜在学术之外狠下功夫;为政绩、奖励和荣升之便,不计手段在“重点期刊”上发文章;动辄成千上万的评审费、鉴定费、报告费,诱使学人舍本逐末。更有甚者,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每年上亿元的财政拨款,这些纳税人的托付,不幸也成为某些“资源导向”型学者(学官)的目标,随着分配中的马太效应,更多的资源落入长袖善舞者囊中。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说:“资源导向”可以催生为数众多的“学官”和“学商”,但要造就出真正的学者很难。学者是在发现、思考 and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发地产生……长此以往,学术研究的水平将下降,学术领域的风气将败坏。”

综观学术经济近年来的兴起及其演化路径,颇耐人寻味:

结构分割——学术常以学科和领域来划分。一些学科带头人便成了最大的学术经纪人。少数拥有特权的教授可以决定大多数普通教师的命运,因为他们掌握了行政和学术的双重资源:职称、经费、待遇,甚至学术成果——往往只需要在一个集体项目上签下自己的大名,成为第一甚至是唯一作者,这些成果便可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获奖,申请后续经费,转化为社会成果,申报专利等等)。

版面效益——不知始于何时,不少学术刊物开始收取版面费,且额度不断提高,有的刊物版面费已达每版1000元。以标准排版每版2000字计,发表一篇6000字论文须交纳3000元版面费。有些刊物不仅收了版面费,另外还收取审稿费、加急费、订刊费等不一而足。学术期刊的版面扩充在近年也十分活跃。此等情形,在中外学术史上堪称空前绝后。

学位资源——四处开花的博士点可谓新兴的学术资源,而分配这些资源的权力完全是由国家行政系统垄断的。学术资源的垄断性迫使学者们向权力低头。要不然你再大的本事也难获得科研项目,你学术上再牛也

难以申请到博士点。以往官场中有“跑官”一说,高校现在则有“跑点”一说,殊途同归,都是冲着利益而去——官员出任教授,教授升任博导,在学术经济的运作下皆可以获得傲人的学术资本和经济利益。于是,掌握了学术资源的官员与学者互通有无,达成了学与官的结合,钱与权的默契。其结果是,学术研究在利益驱动下丢弃了自主和独立性,也丢弃了必须的社会担当。

也有学者认为:学术经济就是一种谋生术,是实现学者的使用价值。因此,出现一些偏差是可以容忍的。

这话说得挺漂亮,可刺眼的现实却不仅仅是出了一些偏差:在学术经济风靡之下,原创作品难见踪影。中国每年有数万种新书上架,数百万篇“论文”面世,其中有不少油墨未干已上了特价书店的柜台;不少“学术快餐”,大多是对付评级和考核的应景之作。许多学术单位把刊物定成三六九等,按照发表文章的刊物等级和篇数来决定提职称、发奖金,往往一些富于创见、受民众好评、被媒体广为转载的评论和文章,在某些学术评价体系中只能获得最低分值,而一些了无新意的讲稿,社会反响几近于零,却要屡屡上权威奖项,甚至获得巨额奖金。对此,有学者愤而提议:开辟一个大型网站,把近年各级获奖成果——向公众展示,以求公允。

胡适先生晚年曾以“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适应”为题发表演讲,强调科学发展需要与社会的适应,还是知识技能的加速“变现”为乐,或是干脆下海,明明白白地去博取真金白银,这实在是当今学界难以回避的选择。



1931年落成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大楼

平民银行扭转乾坤

高超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经济史学者

20世纪初,现代银行落户中国。但当时的银行在储蓄上极度依赖官僚权贵,在放款上则热衷于地产和证券投机,直到191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开业,这一状况才有所改观。上海银行从小到大,立足吸纳普通民众和小业主手中的资金,致力于支持工商实业的发展,时人称为中国第一家真正的商业储蓄银行。这家银行的灵魂人物就是其创办者陈光甫。

1903年,22岁的陈光甫作为湖北代表的随员参加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8个月后博览会结束,他却决定留在美国读书。他取得官费津贴,先后就学于辛普森大学、美以美大学,1906年转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4年后毕业于这个至今仍然令年轻人神往的、全美排名第一的商学院。除了功课,在这里给陈光甫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宾大的创办者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出身穷苦,但他从天空抓到了闪电,从专制者手中夺回了“权利”,经商、从政,研究科学都取得了令人嫉妒的成就。20多岁时,富兰克林为自己制定了一个道德计划,共十三条:节制、沉默、秩序、决断、俭朴、勤劳、诚恳、正直、中庸、清洁、宁静、贞洁、谦逊。富兰克林制作了一个表格,每天都要检视自己是不是做到了这些要求。

1909年,陈光甫学成回国。1915年6月,陈光甫34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挂牌成立,投资号称10万,实际只有8万,股东也就是全部投资人万人。最大的股东庄得之(常州人,洋行买办,盛宣怀的亲戚)投资2万元,为董事长。陈光甫借来的5000元投资,自任总经理。这个自称“平民银行”的新来者简陋得近乎寒酸。同年成立的盐业银行捐资190万元,资本最小的中华商业储蓄银行也有25万元,甚至连当时稍具规模的钱庄,如永丰、福康、顺康,也要比上海银行的资本雄厚。开业典礼,陈光甫连银钱会的董事朱五楼都不敢请,因为人家很看不起他。

当时的中国分为两个界限清晰的阶层,他们就像两个独立的小王国,收入差距极大。这个前提决定了当时银行的经营路径。银行基本都是以权贵巨商为吸储对象和贷款对象,结果财富就只在他们的圈子中循环流动。比如北四行中最新派的金城银行,创办时北洋军政官僚和前清遗老的存款占了90%,1927年增资以后,北洋军阀和官僚的投资仍然占一半以上。

这种状态极大地限制了银行发展,一方面,银行的资本来源过分依赖于官僚权贵或者政府存款。这种存

历史贵在求证而非想象力

周到

西南证券研发中心副总经理

专门研究古代韩国史的韩国大田大学哲学系教授林均泽所著《韩国史》(书镇出版社2002年12月版)所附古代地图,引来中国读者的疑惑和关注。在这幅地图中,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在内的长江以南中下游地区为高句丽土,朝鲜半岛和秦岭南、淮河以北以及康、藏地区受百济统治,黑龙江南北、外蒙古及俄罗斯的亚洲部分属高句丽版图。而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唐,则龟缩于四川、贵州、云南部分地区。有中国人因此提出异议。韩国驻沪领事馆方面回应说,该书并不代表韩国历史界的主流观点。林均泽现已退休。

新罗、百济、高句丽并存时期,被称作“三国时期”。《三国志》、《三国志》记载的就是这段时期的历史。其中,新罗、百济从未离开过朝鲜半岛,高句丽也未在辽宁以南活动过。

新罗国号在朝鲜半岛使用六百多年。徐罗伐居西干元年(公元前57年),朴赫居世被辰韩六个部落推举为居西干。徐罗伐居西干元年(公元65年),伐齿毗解解脱改国号为鸡林。鸡林朴阿达罗三十一(84年),昔伐林代朴氏即位。鸡林昔基临十年(807年),昔基临改国号为新罗。新罗昔基临四十七年(856年),奈勿王金楼寒代昔氏即位。新罗智证王六年(605年),智证王金大路实行州、郡、县制度,建立起效仿中国中原王朝中央集权的政权。新罗孝恭王十六年(912年),神德王金晖代金氏即位。新罗敬顺王九年,其国为太祖王建所灭。新罗位于洛东江以东,是古代朝鲜半岛东南部的国家,其都城为金城(庆州)。

百济是古代朝鲜半岛西南部的国家。百济扶余温祚元年(公元前18年),高句丽王王扶余温祚率部众定于慰礼(今首尔附近),即位。后屡迁都。百济扶余丰三年(新罗文武王三年),为唐与新罗联军所灭。

高句丽则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

款非常不稳定,一笔存款的转移就会对银行的经营产生致命打击。另一方面,银行也苦于不能为聚集起来的资金找到出路,资金来源的特性使他们不敢也不愿意向工商业投资,他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捕捉到最快的挣钱机会。

于是,银行家只能投机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或者经营政府公债。上海公共租界地价最贵的中区,1911年每亩29794两,1924年涨了一倍多,66729两,1930年陡涨到107878两。其中最大的炒家就是银行。这里头的危险,银行界并非不自知。20年代初,一场信贷风波就让许多银行破产。1932年“一·二八”事变致使上海房地产市场骤变,地价突然下跌,金融市场陷入恐慌与动荡。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陈光甫决定开一个以普通百姓为服务对象的“平民银行”。为了吸引来自平民的存款,上海银行率先开办一元钱存折(一元钱即可开户),创办各种小额储蓄,汇集中小企业和小额社会闲散资金,还开办了零存整取、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蓄、养老储蓄,礼券储蓄等等有利于市民按计划过日子的储蓄项目;在各大中学校设立了办事处,为学校代收学费;提倡学生勤俭节约、零星储蓄;在教会中也吸收外国人的外币支票转作存款等。这些做法开始不被银行界同仁认可,他们认为这不是银行的正当经营方式。因为在他们的经验里,银行业是特权阶层的一部分,它必须适应上等人的规矩。

可陈光甫却认定,银行就得跟普通人接近。为此,陈光甫命令各支行机构的大门要开得较一般银行小,上海总行大厦,还特意把几米宽的大门封闭了,出入改走边门。陈光甫明智地意识到,如果银行搞得太过气,小额储户就可能不敢上门。

到了1936年,上海银行的储户共计15万7千余人,按当时人口5亿计算,那么每3000人中就有一人在该行开户。正是一般公职人员、职员、教师、自由职业者、家庭主妇、一般个体经营者等小人物,把上海银行的储蓄存款额从1915年的57万元增至1926年的3244万元,这个数字在当时的全国百余家银行中位居第五。又10年,1937年6月底,上海银行存款总额接近2亿元,约占全国私营银行存款总额的十分之一,在民族资本银行中遥遥领先。

上海银行的成功,极大地改变了银行在中国的经营作风和发展方向,就连一向眼高于顶的中国银行也开始面对普通储户,开设一元存折。因为竞争是残酷的。陈光甫面向普通民众和向工商实业贷款获取稳定收益的做法,终结了那种舒舒服服,只要搞定几个有钱的没落王孙就能过好日子的时代。可以说,陈光甫的平民银行实践带来了中国银行业的资本主义革命。

东明王元年(汉建昭二年,前37年),东明王高朱蒙建都于纥升骨城(今辽宁桓仁满族自治县五女山城)。纥升骨城当时属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管辖。高句丽后迁都平壤。鼎盛时期,其势力范围包括吉林东南部、辽河以东和朝鲜半岛北部。高句丽高安陞三年(唐咸亨三年,669年),为唐与新罗联军所灭。

韩国驻沪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表示,林均泽《韩国史》并非教科书,而是反映个人观点的一般出版物。但这也表明,韩国官方对韩国居民的胡说八道、扰乱视听,并不禁止。

中国民间绝无针对相对予以回应的意思。中国学者不可能写中国历史上的领土包括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这样的书。其原因大概有两条。一是中国历史有非常严谨的传统,不愿意也不屑闭着眼睛瞎说。二是中国的新闻出版体制也容不得作者胡言乱语。尤其在涉及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出版社绝不会有半点含糊。要是在历史书上“侵占”它国版图,责任编辑那关恐怕已经过不了。

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循规蹈矩。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工程于2002年启动。它包括:古代中国疆域理论研究;东北地方史研究;东北民族史研究;古朝鲜、高句丽、渤海史研究;中朝关系史研究;中国东北边疆与俄国远东地区政治、经济关系史研究;东北边疆社会稳定战略研究;朝鲜半岛形势变化及其对我东北边疆稳定的影响研究等等内容。在高句丽史的归属问题上,则是通过学术研究提出来的。

我们以后也实在没有必要学习林均泽的勇气和想象力。中国真相和平崛起,就得了解历史事实,总结历史经验。比如说,宋、元、明、清几个朝代中,汉族政权的统治区域,主要在汉族地区。明的领土面积还不如藏鞋。中国现在的疆域,主要是由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奠定基础的。但在清咸丰十年(1860年)后,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和今新疆西北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先后被沙皇俄国侵占。从1921年起,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内蒙古实际上已经丧失。作为当代中国人,我们现在要吸取教训,立足现实,面向未来。这才是实实在在地有利于民族振兴。我们不必津津乐道于历史上的阔气,更不必吹嘘历史。